

中國和平外交與美國霸凌主義的強烈對比



學者論衡
劉兆佳

全國兩會的勝利召開和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的順利產生，對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都必然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全國兩會之後，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一個在過去幾年成功通過了新冠疫情嚴峻考驗的、擁有龐大人口和資源的中國，將會更團結一致、砥礪前行，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推進民族復興的共同目標而奮鬥不懈。從國際格局變化的角度看，一個強大的中國將會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央，並決心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履行對國際社會乃至全人類的責任，尤其在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和建構更公平和合理的國際秩序等方面。

3月13日，習近平主席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後發表重要講話，莊嚴宣布中國的立場：「我們要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發展惠及世界，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我們要扎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既用好全球市場和資源發展自己，又推動世界共同發展。我們要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始終站在歷史正確一邊，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

全球安全倡議，為世界和平發展增加更多穩定性和正能量，為我國發展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習近平主席揭櫫的中國對全世界和全人類的關懷和責任，在全國兩會召開前的一段時間已經在中國的一連串重大行動中清晰體現，並肯定會在未來會以更大力度和更高智慧推進和貫徹。

「中國方案」維護世界和平

過去一年，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全面推進，組織和參與多場重要國際活動，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開拓了中國的國際活動空間，也促進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去年12月，習近平主席出訪中東的元首外交之旅在國際事務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基本上制定了日後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建構和全面提升戰略夥伴關係乃至中阿命運共同體的框架，對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和對世界政治局勢有深遠的影響。

今年2月24日，外交部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提出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停火止戰和啟動和談等重要主張，為日後歐洲乃至世界和平貢獻「中國方案」。這個「中國方案」除了美西方外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日後的發展將會證明對解決烏克蘭危機有利。

尤其令世界矚目的，是在中國的支持下，沙特阿拉伯與伊朗於今年3月6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會談，中沙伊三方於3月10

日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聲明表示，三國宣布，沙特和伊朗達成一份協議，包括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係，在至多兩個月內重開雙方使館和代表機構；強調尊重各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雙方同意兩國外長舉行會晤，啟動上述工作，安排互派大使，並探討加強雙邊關係。

此份協議對促進中東地區的持久和平意義極其重大，更標誌著作為一個擁有強大政治和道德實力的中國能夠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發揮不可替代作用。

全國兩會之後，中國的外交活動將會更趨活躍和頻繁，特別在大國外交、元首外交和「促和勸談」等方面，為紛亂的世界注入更多的和平元素。中國的外交政策與美國的霸凌主義和不斷訴諸武力、對世界和平不利的對外政策形成強烈的對比。

全國兩會前後，中國加大力度推進全球化或「再全球化」的工作，並努力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一起示範新的國際秩序和推動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改革。「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金磚國家體系和上海合作組織不斷增加新成員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生效實施，都彰顯了中國致力推動全球化或「再全球化」的成效，以及中國在這些組織內推動實現「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贏」等新型國際關係原則。在美西方主導的國際組織中，中國也不遺餘力地提倡和推進有利於建設開放型世界經

濟、維護多邊主義、保障發展中國家權益和造福各國老百姓的改革。

全國兩會之後，在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大力認同和支持下，無論是新國際秩序的形成或舊國際秩序的改革都將會加速進行。這將會進一步讓中國體現習近平主席提倡的「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重要主張。

為加快國家的經濟復甦和發展步伐，中央提出多項重要舉措，包括着力擴大國內需求，預期今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赤字率擬按3%安排。中央亦會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擴大市場准入，加大現代服務業領域開放力度，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做好外資企業服務工作，推動外資標誌性項目落地建設。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開放的中國大市場，一定能為各國企業在華發展提供更多機遇。」

「中國智慧」推動世界發展

多年來，體積龐大和持續增長的中國經濟成為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貢獻了全球經濟增長的相當比例。新冠疫情肆虐期間，這方面的動力有所減弱。過去幾年，全球經濟飽受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通貨膨脹、利率上升、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供應鏈斷裂和西方經濟增長乏力等因素所困擾。全國兩會後，堅持改革開

放和經濟增長有力的中國必將再次為全球經濟復甦和發展源源不絕注入新動力，也為外國企業和資金提供難得的投資和發展機遇。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模式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舉世矚目，也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西方國家提供了西方模式以外的發展路徑選擇。在總結經驗後，中國將更能夠在發展的理論上有所建樹。近年來，「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全過程人民民主」、「新發展理念和格局」、「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共同富裕」等重要概念紛紛破繭而出，並在國際上獲得普遍重視和敬重，為世界的和平和發展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貢獻了不少「中國智慧」。

全國兩會後，相對於難以解決西方的嚴重政治、經濟和社會困局和越來越不獲世界各國乃至西方人民認可的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而言，中國的發展模式和它不斷締造的「中國奇跡」必將更受到全世界的重視並對全球發展帶來積極作用。

簡言之，全國兩會後，越趨富強的中國必將對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良性重塑貢獻寶貴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中國發展的外溢效應也將更為強大。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誰最希望撤銷「禁蒙面法」?

新聞背後 卓銘

等了三年時間，特區政府於本月初撤銷「口罩令」，意味社會完全復常，香港徹底除去疫情的陰霾，市民臉上終於能再現笑容。但同一時間，有人再挑矛盾，把撤銷「口罩令」與「禁蒙面法」刻意連結起來。一日為公共衛生理由，政府不應限制市民在集會遊行期間戴口罩；又云「禁蒙面法」剝奪港人日常戴口罩的權利……究竟是誰這麼希望撤銷「禁蒙面法」，在背後操弄這些似是而非的觀點？社會各界與特區政府都應提高警惕。

首先不得不問的是，「禁蒙面法」究竟如何跟撤銷「口罩令」扯上關係？撤銷「口罩令」，簡言之，就是回復至三年前未有疫情時的情況。當時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固然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戴口罩，即使是「口罩令」實施後，也從未見任何人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戴了口罩，而被控違反「禁蒙面法」。現在「口罩令」撤銷了，理解起來就更加簡單，何解疑問反而多了起來？

也許這涉及一點歷史因素。「禁蒙面法」的正式生效日期，是2019年10月5日，而香港錄得首宗新冠病毒個案，是2020年1月23日，而實際上，不少市民在2019年年尾，已因新冠疫情新聞而自主戴起口罩。

反中亂港勢力蠢蠢欲動

從「禁蒙面法」實施，到香港社會廣泛建立起戴口罩的習慣，兩者只相差大約三個月時間，這就造成了兩個結果：第一是「禁蒙面法」的效果被「沖淡」了，疫情在無意中為暴徒戴口罩掩飾身份提供了絕佳的掩護，亦間接令政府在短時間內，無法充分地向社會宣傳「禁蒙面法」的作

用和立法目的，這就導致第二個結果，即一部分市民對「禁蒙面法」未作詳細了解，而給一些別有用心者可乘之機以大做文章。

「禁蒙面法」第3條列明，在非法集結、未經批准集結、公眾集會、公眾遊行等四類活動中使用蒙面物品，才算犯法。而「使用蒙面物品」的標準，為「相當可能阻止辨識身份的蒙面物品」。不難理解，「禁蒙面法」由始至終，只是禁止在某些被規管的集結、集會或遊行時蒙面，完全不影響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假如市民確實有佩戴口罩的需要，在集會遊行期間是否必須冒健康風險而除下口罩呢？條例對這類情況亦列明了免責辯護，包括一、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遊行，正在從事某專業或受僱工作，並於正在作出與該專業或受僱工作相關的作為或活動時，為了該人的人身安全，而使用有關蒙面物品；二、宗教理由；三、先前已存在的醫學或健康理由。即如果是孕婦、有氣管敏感或免疫系統問題的市民，仍然可以在集會遊行期間戴口罩。

特區政府撤銷「口罩令」一舉，合情合理合法，但一些人偏偏要拿「禁蒙面法」來說事。背後原因，其實不難理解，有人就想利用疫情過後的機會，逼迫政府一併撤銷這條維護香港社會安寧的法例。雖然目前反中亂港勢力已然潰不成軍，或轉成地下活動，但這不代表他們就此罷休，事實上，香港面臨的安全威脅並沒有完全消除。上周警方國安處拘捕兩名男子，涉嫌管有「羊村」繪本等煽動刊物；再早一個禮拜，警方亦拘捕一名23歲女子，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港獨」的信息。這說明，一些人仍未放棄煽動暴亂、煽動「港獨」

的目的，而要達到煽動的最大效果，他們就需要把遊行集會期間的蒙面行徑合理化，所以才突然大肆抹黑「禁蒙面法」打壓人權自由云云。

說到這裏，又不得不重提「禁蒙面法」為何立法，並為何有所必要。2019年的黑暴之所以得其名，不只因為暴徒以黑衣為記號，更由於其作奸犯科時，往往利用口罩、圍巾、墨鏡、頭盔等掩飾身份，不只藉此逃避警方追查，更因此而令更多人被煽動、有恃無恐地突破暴力底線。

「禁蒙面」是世界通行慣例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津巴多在著《路西法效應》中，就提出即使是普通人，在特定情況下，人格、思維和行為方式都會突然失序，甚至集體作出違反道德的罪行。其中一種情況就包括去識別化，透過匿名、變裝或使其他人無法看見自身樣貌等方式，避免承擔責任。他更特別舉出20世紀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的三K黨作為例子，當年美國有不少州份因為三K黨的惡行而通過禁蒙面法。如果把目光移到歐洲，例子就更多：法國、德國、意大利……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無一例外全部有禁蒙面法，其中不少更是21世紀後才訂立。也就是說，禁蒙面法並不是過時法律，而是針對現代廣泛國家所面對的問題而衍生之需求。

至此，「禁蒙面法」究竟有否侵犯公民權利、損害自由，只要了解過立法前後的因由和外國的經驗，相信都不難作出定論。藉這個機會，其實特區政府也應該重新宣傳並向公眾解釋「禁蒙面法」，一來避免有人加以利用大做文章，二來也是打擊黑暴殘黨，讓他們不敢輕易造次。

更好統籌香港的發展和安全



有話要說
李曠怡

今年兩會是落實中共二十大精神的一次重要會議。當前世界正逐步走出疫情陰霾，社會穩步復常，經濟開始回暖，但在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增加等不確定因素影響下，國家今年的發展既有機遇也有挑戰。誠如國務院總理李強強調，「我們中國人不會被任何困難所壓倒。」對於中國經濟的前景，他用八個字來概括，就是「長風破浪，未來可期」。

事實上，過去三年全球各地均受到疫情的衝擊，三年多來，我國始終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科學精準防控，因時因勢優化調整防控措施，有效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較快恢復了經濟社會正常秩序，讓社會在疫情期間得以穩定發展，成績有目共睹。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去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增加至121萬億元，人均GDP達1.27萬美元，財政赤字率控制在2.8%，中央財政收支符合預算、支出略有結餘。這個成績的確是來之不易，也顯示出國家經濟的強大韌性。

展望未來，今年世界經濟形勢總體不容樂觀，不穩定、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比較多，如何穩增長對世界各國都是一個考驗。今年，中國經濟預期增長目標定為5%左右。李強總理指出，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作了全面部署。基本取向是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他表示，中國發展確實有很多優勢條件，比如，市場規模巨大、產業體系完備、人力資源豐富、發展基礎厚實等，更重要的是制度優勢顯著。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相信隨着中國經濟增長，也將持續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重要貢獻。

扎實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後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而李強總理亦指出，有祖國作堅強後盾、有「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香港、澳門的地位和作用只會加強，不會削弱。中央一直重視、支持香港發展，但我們也要思考香港該如何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何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需，抓緊國家發展帶來的重大機遇，為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為民謀福祉。

香港與國家的發展一直密不可分，香港一直扮演國家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在「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中，香港憑着「一國兩制」的優勢，必定大有作為。

習近平主席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我們要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始終堅持人民至上，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並扎實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香港必須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以回應國家的期望。湖南省政協委員、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制定數據管理框架 邁向「數字化政府」



議會內外
容海恩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兩步走總體戰略：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未來五年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主要目標任務之一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推進。展望到了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筆者認為，現時特區政府在數據開放方面有所不足，影響治理現代化，政府應當配合時代趨勢，善用科技和數據，促成「數字化政府」。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希望香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政府治理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首要全面觸及的領域。換言之，政府治理現代化可謂衡量國家或地區的第一把標尺。

用好科技提升治理能力

而治理體系改革的原則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筆者認為，特區政府若要推動治理體系改革，必須重點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政策體系的整合性問題。包括清楚掌握政策安排與某些具體政策的關係、政策頂層設計與政策分層的對接關係、長期政策與階段政策的關係等。這些關係若模糊不清會影響政策成效，政府在政策制

定和執行過程中，必須確保政策不能以局部代替整體，又不能以整體代替局部；同時既不能以靈活性損害原則性，又不能以原則性束縛靈活性，做到精準施政。

二是政策執行中的「中梗阻」問題。「中梗阻」主要體現在部分公務員執行力不足，缺乏責任感，不願負責亦不敢承擔，導致工作效率低下，不僅影響行政效能與政策落實，大幅降低了行政效率，更損害了特區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令市民無法感到政策帶來的獲得感、幸福感。因此政府應當大刀闊斧整頓公務員工作態度，確保政策執行能取得效果。

此外，筆者建議政府善用數據和科技，加快推動科技應用，達至治理體系現代化。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提出，全速引領香港實現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願景，當中包括建設智慧香港，提升民生生活質素。可惜的是，現時政府在數據開放方面略有

不足，參考香港開放數據指數，雖然整體而言，香港公共數據開放總得分從2021年的69.9分，上升至2022年的72.4分，微增2.5分，成績不俗，但在細項「數據管理框架」完全不合格，顯然需要徹底改善。

「全球數據指標」將數據的四大支柱定義為數據的管治（Governance）、能力（Capabilities）、可獲得程度（Availability）、使用及影響（Use and impact），當中香港在後三項指標均在全球較高位置，唯獨在「管治」範疇稍為遜色，當中包括上述提及的細項「數據管理框架」，原因在於特區政府沒有制定面向全社會的數據共享框架，而是各部門各自為政，自行制定年度數據開放計劃，跨部門的數據流通寥寥可數，成效如何不言而喻。

筆者認為特區政府應着手收集和開放數據，同時鼓勵公私營機構開放更多數據，

並且與內地探討數據向港流通，達至社會各界能善用數據，共同推動城市現代化發展。事實上，政府審計報告就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方面，亦倡議在多方面善用科技，而不同領域的數據正是推動科技應用的重要根基，政府應大力推動有關風氣，特別是跨部門之間的數據互通、共享，務求改善不同部門之間的協調工作，藉此提升效率。

綜合而言，開放數據是推動「數字化政府」不可或缺的一環，有助政府能更好地履職，實踐政府應當堅持的治理價值，如民主、法治、公開、公平、廉潔、效率等，一方面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另一方面維持良好治理秩序，長遠做到「以人民為中心」，達至治理體系改革，邁向良政善治的局面。

新民主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執業大律師